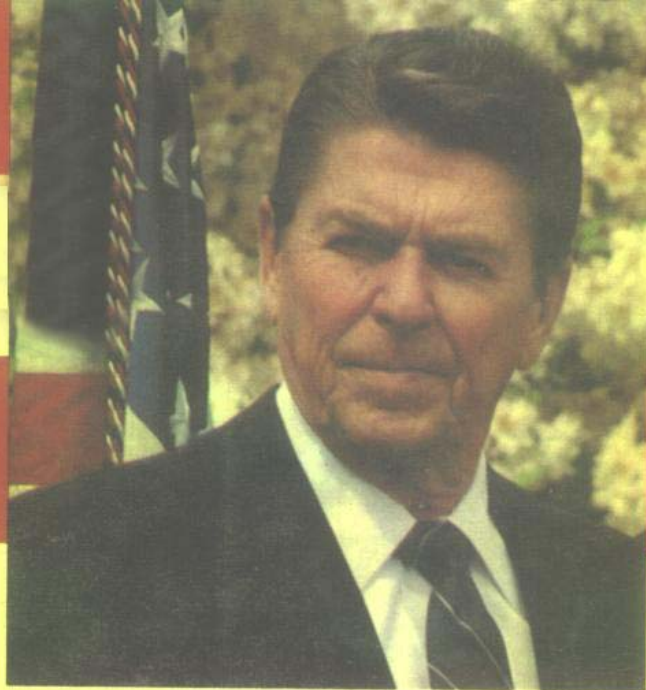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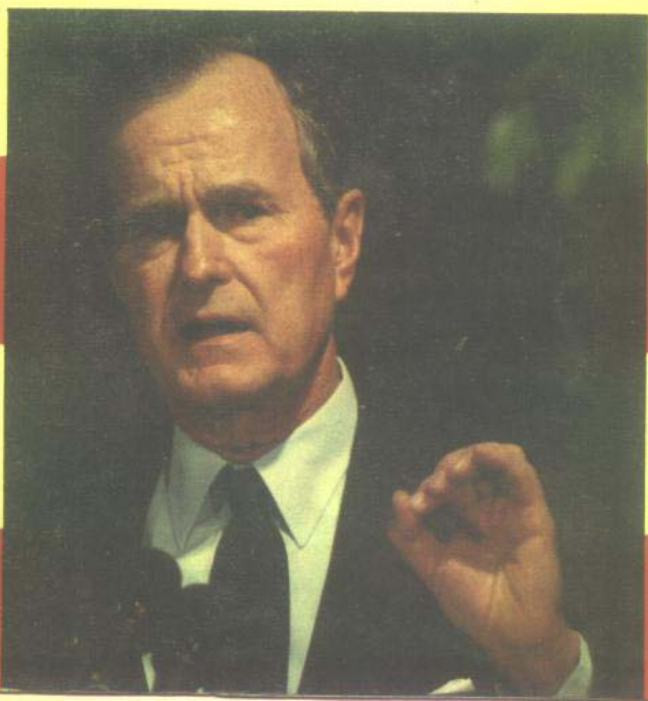




里根与布什

—中央情报局秘密战



里根与布什

—中央情报局秘密战

VEIL: The Secret Wars of the

CIA 1981—1987

By

Bob Woodward

1987 Simon & Schuster, Inc

据美国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

1987年版译出

里根与布什

——中央情报局秘密战

〔美〕鲍勃·沃德伍德 著

卫林朱燕 译

孙迎春 栗启初

刘兴秋 周洪轩 校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434,000 开本:850×1168¹/₃₂ 印张:18¹/₄ 插页:4

印数:1—20,000

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陈 骏

责任校对:王冰晶

封面设计:安今生

ISBN 7-5382-0788-0/C·22

定 价: 6.85 元

序

闹钟吵醒了中央情报局局长斯坦斯菲尔德·特纳。他最讨厌早晨的起床了，故此他把闹钟拨得尽可能晚些——早晨七点——这是一个星期四，1980年11月20日。今天是伊朗人质危机的第三百八十三天；伊朗扣留的五十二名美国人质本月的早些时候已将吉米·卡特从总统的宝座上推了下来。特纳今天须向当选总统罗纳德·里根汇报一下情报工作。

这年的早些时候，在联邦调查局于华盛顿郊区发现了一些伊朗人在威力很大的步枪进行打靶练习后，特纳住房的一楼便一连数周都设有警卫，一天二十四小时不断。但现在警卫已经撤销，房子里很安静。

特纳是从海军退役的四星上将，五十六岁，正是春风得意之时。作为系统分析家、海军“思想家”和罗氏奖学金研究生，他总

是力图超越时空的局限洞悉重大问题。不过，他为人易动感情，此时须在新旧两个老板之间周旋，故此他受到过渡时期多种矛盾情感的折磨。

首先，他需要断定什么时候，以怎样的方式将货真价实的秘密情报传达给里根，新总统需要了解那些可能具有爆炸性影响和极大危险的工作部署和情报刺探术。这是箱底货，从未泄露给新闻界，亦未被苏联特务探窃。这种信息只能是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只能他们两人知道，直到里根任命了从他手里接过情报工作的人为止。特纳不能将秘密泄露给那些参加了前面两次汇报并且可以料想还要参加今天汇报的追随里根的政客们。在特纳最终必须解释给当选总统听的一项最为机密的情报作业中，有一百多人经常存在着生命危险。

特纳还须使里根注意到有关的涉及面甚宽的哲理问题——谍报工作与秘密行动之成功机会与失败危险。总统就是要在这些问题上作出实质性抉择，而里根似将给情报工作带来新的活力。

特纳很想改善一下自己对里根的看法。在以前的汇报中，里根表面上很直率，但骨子里却令人难以亲近。里根挥手让特纳谈下去的时候显得很轻率，态度不冷不热，似乎是在用一个笑声、一个好莱坞故事、一个保守的信条对待世界上的重大问题。过去，卡特对他总是要进行严肃的、几乎令人难以忍受的盘问，两位总统的态度是多么迥异呀。他与里根的接触越多，便越是怀疑此人的头脑。他暗中用来形容他的一个词是“愚蠢”。

特纳需考虑的最后一件事是他自己的前途问题。他想让里根知道，他愿意，不，他渴望任中央情报局长。里根及共和党人攻击卡特，说他将中央情报局禁锢起来了，使之不能有

效地开展谍报工作。共和党人说，身为情报局长的特纳对卡特的人权战过于顺从了，说他对最新式的卫星和电子窃听技术等干净、被动且比较安全的东西过于醉心了，一点风险也不敢承担。“衰弱”一词被用来描写中央情报局。特纳想，如果当选总统让他说的话，他完全可以驳倒这些无稽之谈。他的情报局所搞的某些情报作业可使罗纳德·里根惊得目瞪口呆。

“里根不想让情报局政治化，他一定会看到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特纳曾对他的高级助手们说。局长的意思是他并没有完，他们对此报以哂笑。他的海军老友赫布·赫图，一位退役海军上校、情报局的公务主任，认为特纳需要某种治疗，好让他看清现实。

“他们绝不会挽留你的，”赫图对他说，“绝不可能。他们在出你的丑。”

特纳仍很乐观，这有时很难做到。总统大选之前，在皮尔里营——“农场”——情报局设在弗吉尼亚乡间的秘密训练机构和专门学院，他曾召集他的十五名高级助手举行了一次行政工作会议。他半开玩笑地让在场的人搞了一次无记名投票。选举结果在一块黑板上公布出来：卡特两票，里根十三票，这无异于迎头一瓢冷水。这差不多就是里根四百八十九票对四十四票的选举团投票结果的真实反映。

大选后的那天早晨糟糕透了。可以明显感觉到中央情报局兰利总部的走廊里洋溢着喜悦的气氛。情报局的人没怎么把头伸到窗外去欢呼，但确有许多人将里根的胜利看得象巴黎解放日一样。

特纳淋浴之后，穿戴整齐，坐下来读了几分钟书。他在学习每周一次的基督科学课。如果现在不看会儿书，这一天就

没有机会了。他喜欢把他的情报局想象成基督教的智能部门——头脑与精神高于一切。

下星期日的课文说：“……用激烈的言词告诉你的病人他必须要觉醒。将他注视的目光从虚假的感性证据上转移开来……”要向内看，那条神示说。特纳想，这对于世上最大最复杂的情报机构的头子来说恐怕很有点可笑。但是他亲身体验过这类教义所发生的巨大效用。他的父亲在股票市场上折本后自杀了，而母亲却活过了二十年代的苦难岁月。后来，他唯一的弟弟惨死在一次车祸之中，特纳便一头扎进了宗教信仰的怀抱，用以对付那种莫明其妙的惨剧和剧痛。他用红笔在“磨难是上帝爱护之证据”一句话下面划了一条线。

没有时间了。他从座位上站起身来，很清楚自己在玩忽课程。特纳身高五英尺九点五英寸，健壮结实，噤噤地跑下楼去进早餐——“撞击速度”，他的助手们这样形容。他厚厚的灰发总是在他前进时产生的微风中轻轻飘拂。那双淡蓝色的眼睛，那种喜气洋溢的短暂微笑，以及那种扶轮社式的规律性言谈举止都与中央情报局的特征相去甚远。

早餐他喝的是果汁和掺有柠檬汁的热水。基督科学不容许喝刺激性饮料，不容许喝咖啡。特纳甚至不喜欢咖啡冰淇淋的那种味道。

桌上有一份《华盛顿邮报》：“据说凯西有望成为中央情报局长。”特纳一把将报纸抓了起来。这种可能性他从未听说过。这个“凯西”就是威廉·J·凯西，现年六十七岁的里根竞选班子主任。特纳感到这种选择是一种倒退，一种绝大的错误。里查德·尼克松曾将其1968年竞选班子的主任约翰·N·米切尔任命为司法部长。难道今年中央情报局成了政治斗争的战利品了？

特纳读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凯西在战略服务处——中央情报局的前辈——工作。”他想这真是牛头不对马嘴，这象是让一个二战老朽的海军上将来充当海军司令。在特纳看来战略服务处只不过是一个老手、老家伙们的联络组织而已。战略服务处的残渣余孽及其工作态度仍存留在情报局内，并给特纳造成了许多大麻烦。那些人是实际作业人员，是局中之局，是兄弟帮派。在与白宫或国会发生危机时，兄弟帮总是要遭祸殃，七十年代中期对情报局进行的那次调查便是如此。但是那些老顽固还是留在了情报局，原因是情报局需要他们。每一任总统、每一任中央情报局长都需要这些忠心耿耿的有不法行为的秘密工作者。他们形成了一个从不正式聚会的俱乐部。他们在秘密工作机构中干得非常起劲，属于那种在奖赏都是秘密的环境中亦能很好生活的怪人。他们既是情报局的长处，也是情报局的弱点。现在，显然有一位兄弟突然出现在情报局门口。《邮报》说凯西在二战最后的六个月中负责向德国境内空投间谍。那是三十五年以前的事了。

特纳本以为他们会对他客客气气地在将消息告诉新闻记者以前先要将他要被解职的决定通知他的。此消息可能是个试验气球吧，要么就肯定是搞错了。在总统竞选以前他甚至从未听说过凯西其人。两周以前，里根在以当选总统的身份举行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曾经宣布，凯西将回去重操律师旧业。

即将被解职的前景使特纳更加坚信是他把情报局从七十年代中期那个黑暗、动乱的时期解救出来的——越战及水门事件、深掘了情报局秘史的国会调查之后产生的那种动乱局面：阴谋暗杀外国领导人、给毫无察觉者服用危险的旨在让人产生幻觉的试验性药品、暗中少量储存总统明令禁用的毒

药和毒液、密折邮件、密查反战美国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他将情报局带出了牛仔时代，与他认作不正常的、过度机密的作法进行了斗争，并用事实表明情报局能够在新规矩下有效地开展工作，新规矩要求向国会情报委作出严格汇报，即使最机密的作业也不例外。他的情报局所搞的工作都不存在问题，他们有国会的支持。特纳相信，如果他们为人所理解，就连里根和美国人民也会支持的。

大选的前一个月，特纳曾避开日常事务整整一周在家避门不出，写出了一份关于过去四年的工作报告，报告中还提出了关于今后四年的计划。报告日期是1980年10月17日，上面打有“局长专用”的印记，那份七页报告远比绝密文件重要。“目标与移交项目”肯定会使里根和他的那伙人大吃一惊。不错，他特纳在控制那些牛仔和老哥们的某些心血来潮的怪念头上曾经遇到过麻烦，但是他终于驾驭住了情报局，现在许多老家伙业已不在。但是产生了一个更大的问题：情报局已经变得非常神经质了。当总统授权干涉他国事务的时候，作业处，这个负责谍报工作的部门，这只独自经营着国外情报站进行谍报活动和进行秘密行动的暗示，总是要予以抵制，并显露出胆怯心理。

特纳曾数次提出要采取新的秘密行动，但作业处逡巡不前。一次，未经请示白宫，特纳给负责国外行动的副局长写了一个条子，问他可否采取什么行动将不利于美国的三个领导人赶下台去——古巴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伊朗领袖阿亚杜拉·鲁霍拉·霍梅尼和利比亚的穆阿马·卡扎菲。副局长的反应是：不行；三国中都不存在有生命力的反对派，或者，情报局掌握的情况还不足以作出支持某一运动、某一党派或某一领导人的决定。特纳所谋求的不过是设法向三个国家某些组织

或个人暗中提供一些经费或援助。福特总统1976年签署的、后被卡特重新肯定的一项行政命令禁止进行谋杀。特纳对此完全拥护，但即使如此，不知为什么那些谍报人员还是唯恐他在将他们引上一条危险的路。特纳对于他们的强烈抵触感到十分吃惊。不论他如何设法，副局长就是不动。他们对严重干涉他国事务感到不安，虽说那就是他们的工作。的确，伊朗国外的反霍梅尼力量收到了一些钱，但至少在白宫看来其目的是给霍梅尼以惩罚，且与可能发生的反革命运动建立一些联系。

特纳还曾建议作业处提出一项有限秘密行动计划，以在危地马拉找到一位温和派政治家并予以支持，甚至给能干的危地马拉人提供津贴。危地马拉政治暴力活动猖獗。它是典型的两股力量相持不下的中美洲国家：右翼军政府对马克思主义左派游击队。那年有数以百计的人死掉。依特纳之见，在这种局势下，暗中给温和派以政治上的支持符合美国利益。

不料作业处的反应就象是他在建议邀请克格勃来参加他早晨九点召开的高级官员会议似的。他们争辩说这种行动有可能使情报局陷入丧失政府政策支持的危险境地，无论如何完全不了解政府取何立场。要是他们选中的人不行怎么办？要是他变成了一个危及主人的怪物怎么办？如果他们将他树起而卡特总统或其他哪位总统的意志都皆然不同怎么办？误入歧途是太容易了。那种叫喊声是一致发出的，故此特纳根本就没敢在白宫提出这一设想。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肯定会支持某种秘密行动计划，但卡特很可能会跳起犹豫不决的华尔兹舞来。卡特当总统的方法是，在布氏的“强硬”观点与国务卿赛勒斯·万斯的“柔和”观点之

间左右晃动。特纳曾私下将卡特称作“反战示威者”。

那个月的早几天，11月4日，特纳在另一份备忘录中增添了一些新观点和个人看法。在“白宫”一题下他添加了“冲突的原因”的字样。他列的单子很长，但许多问题都是在他与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之间来回流动的，布氏似将情报局视为自己的工具。在一次军备控制情报问题上，当特纳一再固执己见时，布氏对他言道：“你不是最高法院，亦非政府的第四个权力机构。你要明确你得听谁的。”

布氏喜欢的是原始信息。负责截取外国信息的国家保密局时常为他提供某国领导人的谈话缮本，或某驻华盛顿外国大使馆发给本国首都的政局分析密码电件。“你看到那条截获的信息了吧？”布氏常会如此发问。特纳认为布氏犯了低级研究人员易犯的典型错误：他相信可依据孤立的电报或其它截获信息解释重大事件。国家保密局截取的信息常常是吹牛大家、消息不确而又自高自大的官员或某大使所报告的不实之词。特纳在国家保密局的标题下写道：“单源信息分析是危险的。”

特纳经常与布氏发生冲突，此人有时非常凶狠。“你们在苏联连一个情报员也没有，”他有一次在与特纳的高级助手们开会时指责说。事实上特纳在苏联发展了几个情报员，不过他知道其中只有一个在真干，有两个丧失了，也许是被杀掉了吧——他说不准。

1977年开始，特纳须每周向总统汇报三次工作，后减为每周一次，终而至于两周一次。他将此归咎于布氏，因为他有一次说他以前在哥伦比亚大学的那些研究生所作出的分析比情报局更为出色。

1979年10月，在德黑兰扣押美国人质前两周，伊朗国

王来到美国看病，白宫欲使情报局在这个被废除的伊朗统治者病房中安装窃听器，以搞清这位三心二意的癌症患者之真实打算。特纳说那位国王和美国公民享有同样的权利，依照法律情报局是不能够在国内搜集情报的。但随后却来了一道书面命令。他强忍怨气下令，在纽约一家医院十七楼伊朗国王的三间私房中安装了电子监视设备，不过他仍旧认为此法不妥。

卡特与布热津斯基将情报视同自来水管道那样的工具。当没有效果，窃听设备没有立即安好，或情报局不能预见未来时，那就意味着需要花钱了。特纳时而模糊时而清晰地意识到，他被同他的情报局和他所服务的总统隔绝开来了。

为与当选总统取得联系，特纳曾将他的第二份备忘录给了代表新政府前来情报局视察的一位过渡班子成员一份。文件送还给他时上面用铅笔写满了提议，要求立即把情报局转变成一支从事反苏研究和秘密行动的部队。在特纳罗列了一些情报局明确特征的地方，他发现了一句字迹潦草的评语：“太不具体，害怕政治争论。”关于国会情报监督委员会及其工作人员，里根班子的大员写道：“左翼分子就是要走极端。”特纳在文件里还看到中央情报局不能“再继续丢人了”等话，一句评论说道：“气候已变。变化还会更大。如果我们带着恐惧心理去干，就办不成什么事。”在特纳谈及中央情报局——一支最讲究实践主义和干涉主义的队伍——之准军事能力的地方，那潦草的评语说：“必须彻底整顿。”好吧，预视整顿顺利，特纳想道。

特纳吃完了早餐，他的司机恩尼斯·布朗出现在车道上，准备送他到市里去向里根汇报。他进车后坐在后排座位上，

那里放着一个内有前晚和今早情报的文件夹。黑色的奥斯摩比牌轿车顺着斯基普威思路拐上了123号大街，扎进了早晨的车流之中。布朗在车群中钻进钻出，熟练地飞速绕过速度较慢的车辆，富于创造性地加快速度，绝不放过任何一次超车机会。

一位情报局警卫，轮流为上将担任警卫的四人之一，将一散弹枪置于前排座位之上。他的目光扫视着车外的一切，注意搜寻异常情况。今天是阳光充沛的美好秋日，但奥斯摩比车的防弹玻璃窗并没有放下，故此车上的人谁也享受不到这种好天气。轿车装有全套高度安全设备，安着装甲板和防雷地板。

特纳在后排座位上来回扭动着身子。他力图将注意力集中在正事儿上，集中在那件最富于创造性、想象力和魄力的计划上。里根从未在联邦政府正式担任过什么职务，象他那样的情报工作门外汉大概对他的计划根本就摸不清头脑。特纳关于下个月的计划仍有可能帮助他保住这份工作。

海军特别控制计划——所谓的“海军特别任务”——是最为机密的行动计划之一。按此计划，美国潜艇要追寻苏联潜艇的踪迹，并在苏联周围进行风险甚大的监视和情报搜集活动，有时还要深入到苏联领海或港口。其活动包括置放高级电子记录器，或曰“分离舱”，以搭到重要的苏联海底电缆上，打入其通信信道。这些似为所有作业中最机密的作业。所有艇上人员的性命都处在危险之中。整个潜艇，所有船员和派去的国家保密局工作组，都被置于险境。这是海军的骄傲；海军热衷于建立富于男子气概的、胆识过人的勋绩。每项重大任务均须经总统批准。一艘核潜艇驶入海洋，置放好电话窃听分离舱，离开那里等候数周后再潜至该处将安装在电

缆上的记录器内之磁带收回。然后，磁带将被送至国家保密局，信息将被分送到中央情报局、国防部和白宫的少数人手中。有时特纳想，与所冒之风险相较，所获取的信息并没有那么大的价值。

他承认，有时潜艇可带回大量有关苏联军事的情报。这是能够从苏联获取大量货真价实情报的不多的几种作业之一。有时，“收获”包括苏联官员相互之间的交谈，暴露出他们的疑虑、谎言和弱点。如同许多成功的情报作业，这一作业的成功也是以对方的错误为前提的。苏联人满以为那些海底电缆是不可能被窃听的，故而那些通信线路使用了不怎么复杂的密码系统，有时甚至根本不用密码。

另一项工程叫作“靛青工程”，是一种正在研究的新式绝密间谍卫星系统，可成为监督未来与苏联订立的军备控制协议执行情况的关键性手段。应用雷达图象，“靛青工程”可透过云层进行观察，或从事夜间工作，而在这两种情况下照象卫星与瞎子一般无二。这种本领在东欧上空尤为重要，在那里所谓的“魔鬼云层”可持续数日甚至数周之久。

有些最佳情报搜集作业是由“特别情报组”加以实施的——情报局和保密局使用最新设备在许多外国首都从事窃听作业的精干小组。特别情报组可创造谍报活动的奇迹，可发回有关欧洲、中东和亚洲外国政府高级会议和重要政治家电话谈话的一字不变的缮本。这对情报局官员化装成美国驻各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刺探情报是一种补充。

在他的“局长专用”备忘录中，特纳曾写道：“对盟国和朋友进行情报刺探的更大需要。”特纳认为，刺探朋友的情报是一件既痛苦又重要的事情。伊朗国王曾是美国和情报局的伟大朋友，而他的情报机构，令人恐惧的萨瓦克，曾经是情报

局在伊朗的主要输油管。特纳开始认识到他们犯了一个多么大的错误。他和他的情报局曾正儿八经地将霍梅尼看作一个和善、衰老的牧师，而现在正是他在扣留着美国人质。特纳结论说，没有谁能够比一个朋友更能给人以突然袭击了。与不友好的国家打交道就容易得多；情报局了解对方将作何举动。

伊朗革命冲击之后，特纳一直在力图加强外国政府及外国情报机构中的领薪间谍网，包括在一些盟国与友好国家之中。埃及就是一个例子。中央情报局在埃及的一项安全作业，原本是以保护安华·萨达特总统并向他提供关于政变和谋杀阴谋之警告为宗旨的，其实也为情报局提供与埃及政府、埃及社会、埃及领导人之间的电子通道和人际通道。萨达特既吸毒又时常犯愁，但特纳从不把这种元首逸事放在心上。不过，情报局不大可能遭到萨达特或埃及事件的突然袭击。埃及有情报局的间谍网。

特纳从获悉情报得知，沙特阿拉伯的皇太子法德喝酒非常厉害，与他的穆斯林宗教之严格禁酒教义背道而驰。特纳也掌握着关于苏联头子利奥尼德·勃列日涅夫健康的绝密信息，这对白宫有利，在举行一系列谈判之前尤为重要。情报工作对于军备控制问题帮助很大；国家保密局能够破译某些有关苏联导弹试验的信息。但关于中央政治局这个苏联最高决策机构的政治情报却几乎等于零。那是卡特和布热津斯基最想得到的信息，但特纳却提供不了多少。

在中央情报局工作期间，特纳一次都没有见到过值得冒着生命危险去获取的情报。尽管如此，他还是催着要更多的情报，因为他就是干这个的。四年中他只有一次拒绝了一项关于实施某敏感的海外情报作业的建议；那是对早先的一次

成功作业的重复，特纳认为搞第二次太冒风险。

下面的两个月，特纳所要做的就是将这些及更多的现实问题讲给新总统听。必须让里根看到情报作业的整个平面图，看到各种作业之间的联系，看到它们有哪些局限性。

例如，在一项称作“颈部按摩”——为一套密码随意选定的名称——的作业中，一套伪造成树枝模样、外覆树皮的高级电子设备将被“安置”在苏联东欧空军基地外面的一棵树上，用以刺探有关苏制高级米格雷达的情报。该基地与一野餐者时常光顾的公园相毗邻，特工人员只需在某周日翻过篱笆墙，爬上树去将设备用螺丝钉拧在合适的地方即可。“颈部按摩”作业尚未付诸实施，因为唯一可找到的情报局专家并非欧洲人，派他混在星期日野餐者中太冒险了，他会很惹人耳目。

情报作业有很大的危险性。有许许多多的事情需要做。有关苏制雷达的情报或许比某些关于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情报还要重要，但是中央情报局怎么也不能把全世界都挂上窃听器呀。

特纳乘坐的奥斯摩比轿车从白宫对面接近拉斐特公园，然后驶上了单行路杰克逊街，在里根居住的716号门前——一座政府所有的砖砌建筑物，市政厅所在地——停了下来。特纳从车里出来疾步走上云级台阶。

里根的临时官邸是一座宽二十二英尺、具有一百一十三年历史的奇妙的四层楼房。六年前，副总统纳尔逊·A·洛克菲勒曾将这座高度安全的市政厅用作以他为首的负责调查情报局可疑国内活动的委员会之总部。里根曾为八名委员之一，虽然他并不怎么积极，二十六次会议，他只参加了十

次。报告打出之后，里根虽为情报局辩护说：“在任何一个拥有大约一万六千人的机构里，总会有一些犯错误的个人做一些不该做的事。”

特纳一进屋，里根就走过来热情地和他寒暄。当选总统不慌不忙，显得自然而和气。他的随员包括当选副总统乔治·布什，布什系特纳之前的情报局长。里根的高级助手，和葛的律师埃德温·米斯第三站在一旁。出席的还有另外三名助手，以及比尔·凯西。

特纳向他们简要地汇报了欧洲军事平衡及中美洲的一些情况。他谈到波兰的近况，苏联人威胁要入侵波兰以摧垮那个闹独立的工会组织。接着他详细叙述了有关越顶卫星侦察照片和从柏林——世之情报首都——等地截获的电子通信情报的情况。

还有人的情报，特纳不无意味地接着说。

凯西把头抬起一扬。

特纳很想向他们透露，情报局有一名深入穿透间谍，是波军参谋部的上校，从华沙为情报局源源不断地输送有关波兰人和苏联人最新意图的信息，但他忍住了。那位上校所提供的敏感情报是印在一种称作“狭单”的文件上，只有那些绝对需要知道的最上层美国官员方可看到。情报是由专人直接送给每位官员的，所用的文件夹带有一种独特的蓝边或一条宽宽的蓝道，表示信息源系一敏感者。卡特、副总统沃尔特·F·蒙代尔和布热津斯基是仅有的可以经常看到这种“狭单”或“蓝道”文件的几位白宫领导人。上校的名字，库克林斯基，在文件中从不披露，只有少数情报局官员知道。

特纳一边讲述着世界各地的危险地区，一边时不时地用眼去瞟凯西。凯西的神态似乎不怎么感兴趣。他讲得很轻快，